

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

1912-1937

徐小群 著

中生代
思想书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中生代
思想书系

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

1912-1937

徐小群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

-1937/徐小群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0225-322-3

I.民... II.徐... III.自由职业者—研究—中国—民国 IV.9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7634 号

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

徐小群 / 著

责任编辑:许彬

装帧设计:林涛 秦 巍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5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322-3

定 价: 28.8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言	1
一、民国时期自由职业者和他们的社团	3
二、民国时期的职业化	9
三、民国时期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13
第一部分 自由职业和自由职业者	21
第一章 20 世纪初期上海的自由职业	23
一、上海的现代经济行业	23
二、上海的司法界、医药界和新闻界	39
第二章 作为城市中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	51
一、自由职业者的生活	51
二、自由职业者的职业生涯和身份认同	69
结语	79
第二部分 社会组织,国家行为和职业化	81
第三章 民国政府与城市社团	83
一、晚清上海的城市社团	83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城市社团	87
三、南京十年时期的城市社团	95
第四章 民国政府与律师业	106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律师群体	106
二、南京政府时期的律师业	120
第五章 民国政府与医师业	128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医学	129
二、南京政府时期的医学	140
结语	153
第三部分 律师,会计师和医师	155
第六章 律师职业与会审公廨:上海的律师(1)	157
一、上海律师公会的组成	158
二、为职业化而努力	165
三、上海律师公会与收回会审公廨	171
第七章 法治原则与民族救亡:上海的律师(2)	184
一、在职业主义和政治行为之间	185
二、进入民族救亡运动	196
第八章 与账房先生告别:上海的会计师	210
一、会计业与上海会计师公会	211
二、公共场域与职业地位	216
三、民族主义诉求和职业利益	219
四、政治控制与职业规范	225
第九章 国粹与科学之争:上海的中医和西医	231
一、中医的防御战	232

二、国粹与科学	237
三、走向中医的胜利	244
结语	254
第四部分 新闻记者和大学教授	255
第十章 从文人到自由职业者：上海的新闻记者	257
一、上海的新闻业与新闻记者	258
二、从“文人”到自由职业者	265
三、言论自由与新闻职业	277
第十一章 学术救国与文化建设：上海的大学教授	287
一、上海的教授和他们的社团	288
二、民族救亡之政治	292
三、“学术救国”的提出	297
四、国民党的“文化建设”	301
五、上海教授与“文化建设”	306
结语	310
结论	313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共生动态	313
二、城市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综述	315
三、从民国到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320
参考文献	326
后记	349

导 言

20 世纪初期的上海目睹了许多自愿结合的社会团体,如同乡会、商会、行会、自由职业团体、宗教组织、秘密会社、犯罪团伙、现代工会和政治党派,以及教育、职业、学术、体育、艺术、戏剧和其他文化团体,林林总总不下几百家之多。出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教育的和文化的各种目的,这些自愿社团以合法的或非法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公共的或私人的形式存在。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以及它们复杂的动机和互动关系,构成了当时上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历史的戏剧性要素,参与了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社会的发展。本书集中分析这些社团中一类重要的但被史学界长期忽略了团体——中国的自由职业者和他们的社团组织。

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曾使用“职业社团”(professional association)一词来指商会、银行公会、教育会及律师公会,其定义含混不清。而本书所关注的群体及其社团包括律师、医生、会计师、新闻记者和大学教授——那些在民国时期被称为“自由职业者”的社会群体。“自由职业”这个中文词的起源还未得到考证,它可能是德文“freiberufler”或“freier beruf”的翻译,但究竟是谁在中国第一次使用或翻译这个词还有待发现。^{〔1〕} 在中国,“职业”一

〔1〕 我要感谢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哈根·弗里伯格(Hagen Friberg),是他向我提出这一德语词汇被翻译成中文的可能性。

词的本意与它的德语词意很相近。也就是说,在很长时间内汉语中没有词语可以区分“profession”和“occupation”这两个英文字,两者都可被含糊地翻译为“职业”。〔1〕直到1929年国民党官方文件才首次使用“自由职业者”这个词来界定包括医生、律师、会计师、记者、工程师和教授在内的职业群体;并用“自由职业团体”来指他们的社团。从此以后,这些群体也都自称为“自由职业者”。〔2〕

然而,这些群体并不完全相同。医生、律师和会计师是自我雇用的或独立的自由职业者,而记者和教授(及工程师)是职业雇员或受薪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在1929年被确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范畴这一事实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它符合国民党以社团主义国家原则(corporatist state)进行社会控制为目的而界定社会群体的计划。第二,自由职业者的概念涵盖了所有起源于西方样板的社会群体,因为在西方这些职业都已经被归入自由职业的范畴。〔3〕第三,这些不尽相同的群体被归入同一范畴是因为他们确实具有一些共性,并且他们本身也意识到了这种共性;换言之,

〔1〕就德国情况而言,见康莱德·杰拉舒(Konrad H. Jarausch):《不自由的自由职业:1900—1950,德国的律师,教师和工程师》,第4—5页;“历史和理论上的德国自由职业”。又见杰弗里·考克斯(Jeffrey Cocks)和康莱德·杰拉舒(Konrad H. Jarausch):《德国的自由职业,1800—1950》,第10—11页;查尔斯·麦克莱伦(Charles E. McClelland):《德国的职业化经验》,第5页。

〔2〕国民党的官方文件并没有把教授社团正式列为自由职业者团体,但是1931年举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时,教授作为一个群体被允许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参加选举。

〔3〕在西方关于职业化方面的学术文献指出,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越来越多的职业需要专门化的训练;由于经过这样的训练,这些职业便要求被承认为具有专业知识的自由职业。关于不同西方社会中的职业化过程,见塞缪尔·哈伯(Samuel Haber):《美国自由职业对权力和荣誉的诉求,1750—1900》;杰弗里·考克斯和康莱德·杰拉舒:《德国的自由职业,1800—1950》;查尔斯·迈克莱伦:《德国的职业化经验》;康莱德·杰拉舒:《不自由的自由职业》;哈罗德·珀金(Harold Perkin):《自由职业社会的兴起:1880年以来的英格兰》;罗伊·刘易斯(Roy Lewis)和安格斯·莫德(Angus Maude):《自由职业者》;里德(W. J. Reader):《自由职业者:19世纪英格兰自由职业者阶级的崛起》。

到1929年这些职业群体已经成为可辨别的并得到公认的特定社会群体。最后,这些自由职业群体的出现和发展也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即现代化的一种具体表现。〔1〕

基于上述观察,本书通过对律师、医生、会计师、记者和教授等自由职业团体的发展以及他们借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研究来揭示关于民国历史的三个重要议题。第一,通过对自由职业者的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功能、社会地位和政治取向的分析,本书将显示,自由职业者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产生于当时的现代化过程。第二,批判地借鉴最近西方学术文献中对“职业化”这一概念的使用,本书将揭示自由职业社团与其他城市社团之间的一些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对自由职业发展本身的关切及其对于职业化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一区别进一步揭示了那个时代不断增长的城市社会的多样性和城市政治的复杂性。第三,最为重要的是,通过阐释民国政府在中国自由职业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和考察自由职业社团与政府及其他城市社团之间的关系,本书将提出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动态共生机制的观点。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城市社会和它与国家之关系的综合考察,本书为观察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间相类似的、仍在持续发展的关系转型提供了一种历史参考。

一、民国时期自由职业者和他们的社团

虽然各种自愿结合的社团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但自由职业团体要到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才出现于上海和其他地

〔1〕 玛格丽·萨瓦蒂·拉森(Magali Sarfatti Larson)指出,对自由职业来说,现代化最具有意义的方面是科学和认知理性的发展,以及相关的合理化和分工的不断发展。见拉森:《职业主义的兴起: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第xvi页。

方。在几个重要方面,中国自由职业者及他们的社团的出现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许多学者所研究过传统的社会组织 and 他们在 20 世纪的变型,如私立书院、宗族、秘密会社、犯罪团伙、行会、同乡会馆和近代商会。^{〔1〕}与上述团体不同,自由职业社团在起源和功能上明显地具有城市的和现代的特性。自由职业者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类型的出现是以下列因素的发展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现代经济和技术,现代大众传媒,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新观念,新的职业生涯,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所有这些因素都产生于城市环境与现代化过程的一种结合。

自由职业者是新一类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传统上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文人士大夫)是指那些兼有儒学、历史、文字方面知识的通才——在历史上这三方面的知识从未在观念上和技术上区分开

〔1〕 关于私立书院,见本杰明·埃尔门(Benjamin A. Elman):《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的知识和社会变迁》。关于宗族,见玛丽·兰根(Mary B. Rankin)和约瑟夫·W.埃斯瑞克(Joseph W. Esherick):《中国地方的精英与统治模式》。关于秘密会社,见让·谢斯诺(Jean Chesneaux)主编:《中国的民众运动和秘密社会,1840—1950》;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上海警察,1927—1937》;布里安·马丁(Bryan J. Martin):《上海青帮:政治与有组织犯罪,1919—1937》。关于商业团体,见苏珊·琼斯(Susan Mann Jones):《宁波帮与上海的金融势力》;爱德华·罗兹(Edward J. M. Rhoads):《广东的商人公会,1899—1937》。大卫·布克(David D. Buck):《济南的教育现代化,1899—1937》;雪莉·加勒特(Shirley S. Garrett):《商会与基督教青年会》;马克·艾尔文(Mark Elvin)和威廉·斯金纳(G. William Skinner):《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约瑟夫·费史密斯(Joseph Fewsmith):《民国时期的政党,政府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人团体与政治,1890—1930》;玛丽-克莱尔·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27》;《上海银行公会,1915—1927:现代化和地方团结的制度化》;魏斐德和叶文新(Wen-hsin Yeh):《上海的侨民》;威廉·罗(William T. Rowe):《汉口:中国一个城市中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威廉·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中的冲突与共存,1796—1895》;大卫·斯特兰(David Strand):《北京的人力车夫:20世纪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关于商会,见徐鼎新和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马明和朱颖:《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关于同乡会馆,见顾德曼(Bryna Goodman):《地方、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区域纽带和身份,1853—1937》。

来。通过废除科举考试,建立西式学校,促进工商业,推行司法改革和准备立宪,清末新政(1901—1911)促使了知识结构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的转变。晚清时代已经出现了一种文人的新角色,即通过撰写供大众消费的文章而成为大众思想的启蒙者和公共事务的仲裁人。这种角色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和文人大相异趣。〔1〕 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发展向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提供了新的职业生涯和新的社会文化角色,包括作为自由职业者而工作和生活。

自由职业者的社团也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了与传统社会团体的差别。早些的研究表明,在传统的或过渡时期的城市社会组织(如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各行会和同乡会)中,同乡关系和家族关系起着重要作用并规范着那些机构的组织和功能。〔2〕 同样,同乡关系也是划分上海工人阶级内部群体并决定其政治走向的分界线。〔3〕 与此相反,尽管自由职业者常常能够并确实参加了某些基于同乡关系的社团活动,这种关系对自由职业社团本身根本不重要。这就提示我们在观察城市社团组织和政治生活时必须注意到它们的多样性。〔4〕

上海的自由职业者最初是受他们职业利益或群体利益的驱动而建立自己组织的。同时,他们也关注着广泛的民族利益并

〔1〕 李欧梵(Leo Ou-fan Lee)和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大众文化的起源:晚清的报刊和小说》;朱家政(Joan Judge):《出版物与政治:时报与晚清的文化变革》。关于清末新政,见玛丽拜斯·卡梅伦(Meribeth E. Cameron):《中国的变法运动,1898—1912》(斯坦福,1931);道格拉斯·雷诺兹(Douglas R. Reynolds):《中国,1898—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关于教育改革,见玛丽安娜·贝斯特德(Marianne Bastid):《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教育改革》;萨莉·博斯维克(Sally Borthwick):《中国教育和社会变迁》。

〔2〕 关于上海战前商界中同乡关系的复杂性,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三章;白吉尔:《上海银行家公会》;苏珊·琼斯:《宁波邦》。

〔3〕 裴理宜(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罢工:中国劳工的政治》。

〔4〕 据掌握的自由职业团体成员的名单,它们的成员来自于全国各地。例如,上海律师公会成员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和同一省份中的不同的县,它的领导成员也来自不同的地方。见《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录》,1934年。

怀抱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法治救国、学术救国的理念,而这些公共目的又同时服务于他们的自身利益。诚然,传统的和过渡时期的城市工业界、商业界和银行界的精英们也怀抱着民族主义情绪和目标,在民国时期他们的社团也采取了民主的组织原则;〔1〕但在以职业利益为基础而建立的自由职业社团和基于其他原因而建立的城市组织之间显然有一种区别。

为了把握自由职业者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的自由职业者是一个新的阶级——既是城市中产阶级又是一个职业阶级,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的形成。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里关于什么要素构成一个阶级或如何给阶级下定义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中产阶级是一个最难以定义的概念。但是有关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学术文献一般都把自由职业者连同政府雇员和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在中产阶级之内。〔2〕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学术文献也提到过“城市中产阶级”、“知识阶级”、“职业团体”和“新的城市阶层”在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出现,但是这些词汇所指的群体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义,充分的分析和深入的理解。〔3〕因

〔1〕 白吉尔:《上海银行公会》。

〔2〕 关于对阶级定义的不同方法,见阿尔伯特·西蒙斯基(Albert Szymanski):《阶级结构:一个批判性的视角》,第 602—645 页。关于西方和非西方社会把自由职业者当作中产阶级来讨论,见帕米拉·皮尔比姆(Pamela M. Pilbeam):《欧洲的中产阶级,1789—1914: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特别是第四章;尤根·科克(Jurgen Kocka)和艾伦·米切尔(Allan Mitchell):《十九世纪欧洲的中产阶级社会》;乔治·拉沃(George Lavau),杰拉德·格伦伯格(Gerard Grunberg)和诺拿·梅耶(Nonna Mayer):《中产阶级的政治世界》;伯格文·普拉塞(Bhagwan Prasad):《关于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研究》;米斯拉(B. B. Misra):《印度的中产阶级》;国家社会经济研究所:《巴基斯坦中产阶级的成长》。

〔3〕 例如,约瑟夫·费史密斯用“中产阶级”一词描述“范围广泛的商人阶层,从相当富有的商人到数以千计的参与国货运动及抵制外货运动的店主们”。显然,他们只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见《民国时期的政党,国家和地方精英》,第 9—10 页。

此,将中国的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职业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来分析,就为研究民国时期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

为了分析中国的自由职业者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处于何种社会地位,我们使用一个折衷的方法给阶级下定义。显然,根据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自由职业者由于他们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可以被认为是中产阶级(既不是资本家阶级也不是工人阶级)。同时,基于给阶级下定义的其他方法,在定义自由职业者的阶级地位时我们可以特别指出他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在劳动分工(脑力劳动相对于体力劳动)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看法和他们的自我意识。而最为重要的并包含上述各方面特征的,是自由职业者对职业化的追求。这种追求反映了一种自由职业者所特有的新的价值观念,而职业化又是一个在制度上和物质上为他们提供利益的过程。的确,当我们把职业化看做一个将个人融入一种自由职业和把各自由职业整合为自由职业共同体或自由职业阶层的过程时,中国自由职业者为职业化所做的种种努力就能得到最充分的解释;而这个自由职业者阶层又恰好占据了上海城市社会的中间层以及社会整体与国家之间的位置。

但是,即使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国的自由职业者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正如民国时期的上海其他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一样。^{〔1〕}虽然自由职业者占据了当时上海人口中相

〔1〕 关于近代上海的最近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上海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都在经济上分化为不同阶层,又因地缘关系、文化水平、政治态度(或对资产阶级来说,政治关系)和地方环境而分裂为不同集团。见埃米莉·豪涅格(Emily Honig):《姐妹与陌生人:上海棉纺织工厂中的妇女,1919—1949》;裴理宜:《上海罢工》;阿兰·鲁(Alain Roux):《三十年代的中国工人:苦力、黑帮和工会组织者》;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克里斯蒂安·亨利奥(Christian Henriot):《上海,1927—1937:市政权力、地方性和现代化》。

当一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由职业共同体一员的意识,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社会集群;各自由职业群体在经济状况、社会名声、政治态度、群体认同、文化功能上都有不同。另一方面,自由职业者也不是分离于上海其他社会成分的自我封闭的社会阶层;恰恰相反,他们与其他城市社会组织和群体有着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联系。实际上,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是民国时期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变化转型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把各种类型的社会群体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

为了把握变化中的城市社会的内在动力和各种关系,本书把重点放在律师、医生、会计师、记者和教授的社团活动上。社团活动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活动,自由职业团体完全是为职业目标而创建的,这就在职业功能上将他们与其他城市组织区别开来。他们只是逐渐地被卷入政治运动潮流,而这又使他们进一步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与其他社会群体和组织联系起来。自由职业团体活动的这两方面特征都很重要,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参与了当时城市政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场景的构成。

我们可以对1912年至1937年间自由职业者的社团行为做一个总的概括。新闻记者和教授是较晚才组织了自己的职业社团并进行定期的社团活动的。他们职业上的成熟与1930年代民族危机时期的政治活动联在一起。会计师利用社团活动来取得在社会上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的曝光;在取得这种地位之后,则在国民党统治下以非政治的形象维持其职业地位。相反,上海的律师最有组织;上海律师公会无论在职业议题上还是政治议题上都发挥了有效的作用。而西医和中医虽然在纯政治的问题很少发言,但他们都同样有效地通过自己的社团组织的活动以获得群体利益。本书的关注之一就是解释这些自由职业团体在社团行为上的差异。

本书关注上海的自由职业群体是出于如下原因。由于开埠通

商而受西方影响之故,中国的自由职业者大量地聚集在上海,而各种有助于自由职业发展的要素也集中在上海。玛丽-克莱尔·白吉尔曾强调:尽管在上海存在着租界,“上海非常明显地是中国的。”反映一种现代的,民主的,和国际的传统,上海代表着少数的和边缘的中国,“但它却和乡村的中国一样真实”。〔1〕本书将揭示,外国人在上海的存在及其支配地位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国自由职业者的行为,但我们不必由此推定上海的自由职业者在总体性格上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同行有根本的不同。在全国性的议题和危机出现时,上海的自由职业团体和各地的同行之间进行了密切交流,采取了共同行动,而前者扮演着领导角色。如果中国自由职业者和他们的社团在城市社会中的角色以及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能在民国时期上海的社会环境中得到解释的话,那么这种分析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其他城市中的自由职业团体。

二、民国时期的职业化

为了考察和解释民国时期上海的自由职业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和国家的相互关系,本书引入了“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这一概念。上海的自由职业者可被视为中国城市社会里一种独特社会类型是由于他们对职业化的关切。以职业化为目标的社团活动将他们与有着表面上相似的组织结构和集体行动的其他城市社团明显区别开来。

在西方学术界,对自由职业和职业化进行描述和下定义时,社会学家通常用两种模式或方法:“属性模式”和“过程模式”(也称功能主义方法和权力分析方法)。属性模式用几个必要的属性来给自由职业下定义。最广为引述的三个属性是:(1)通过高等教育而获得理论和专业知识;(2)不计报酬而为公众服务的职业道德;

〔1〕 白吉尔:《另一个中国:1919—1949年间的上海》。

(3) 以自我管理和通过职业社团控制入业标准取得在提供某种职业服务方面的自治和垄断。一些学者提出了更多的属性,但社会学家欧内斯特·格林伍德认为上述三个属性是基本的而其他属性则是衍生出来的。〔1〕

过程模式是在回应和批判属性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程模式论者认为属性模式无批判地将某些职业群体为挣得自由职业者地位而提出的理由作为自由职业的属性。他们认为学者所应该做的是分析那些职业群体如何企图通过提出他们的主张而取得合法性地位。他们进一步指出,属性模式的偏颇还在于刻板地描绘自由职业,而事实上所有的职业群体都处于从非职业到自由职业这一持续线上的某一点。一些使用过程模式的学者提出了职业化的范式,以显示在一定的时间阶段上某些有决定意义的属性将会出现,但学者们对这些特别阶段出现的顺序没有取得一致意见。〔2〕过程模式的拥护者还指出,属性模式对职业群体在追求自由职业地位过程中如何受到阶级结构的制约缺乏必要的敏感,并且忽略了国家在职业化过程中的作用等重要的变量。〔3〕简言之,过程模式强调将职业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分析,而这一过程是受阶级结构,国家的作用,和自由职业者对职业权力的获得和使用所制约的。

虽然过程模式(或权力分析方法)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对自由职业的研究,但由于它只以英美社会的经验为标准,采用这种方法的学者忽视了欧洲大陆国家自由职业群体的经验。比如,拉森曾经认为自由职业在法国和德国兴起的情况与英美社会相比更接近

〔1〕 欧内斯特·格林伍德(Ernest Greenwood):《自由职业的特性:一个回顾》;罗纳德·帕瓦克(Ronald M. Pavalko):《职业与自由职业的社会学》,第19—29页。

〔2〕 罗纳德·帕瓦克:《职业与自由职业的社会学》,第34—35页。

〔3〕 同上书,第29—38页;托伦斯·约翰逊(Terence J. Johnson):《自由职业与权力》,第21—38页。

于公务员兴起的模式,她因而选择研究英美社会中“更纯粹”的职业化特征。〔1〕 弗里德森也认为,“作为一个制度上的概念,‘自由职业’一词只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在此历史时期内有限的几个国家有内在联系”。〔2〕

西方学者最近的关于职业化的研究纠正了这一偏见。这些研究指出,以英美经验为标准限制了对欧洲大陆各国职业化过程的充分理解。比如,在自由职业群体和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以前认为自由职业群体在英美社会里不受国家干涉的假定需要纠正。因为,在那些社会里自由职业群体利用了国家权力来加强他们对职业服务的垄断和对服务市场的控制。〔3〕 另一方面,在诸如法国和德国这样的社会里,国家在自由职业的形成和管理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职业化的过程在那里照样存在。正如拉森后来修正她以前的看法时所说,“过去存在过,现在仍存在着,不止一种职业化的模式”。〔4〕

受上述学术成果的启发,本书将用职业化概念来进一步说明中国自由职业者与民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民国时期,上海的自由职业者从来没有同时显示出格林伍德所提出的三个主要属性。如果用一系列更详细的属性来衡量的话,他们甚至没有资格被称为自由职业者。然而,从把职业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视角来看,中国自由职业者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被恰当地看做民国时期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职业群体在上海和各地的崛起。本书所研究

〔1〕 玛格丽·萨瓦蒂·拉森:《职业主义的兴起》。

〔2〕 埃利奥特·弗里德森(Eliot Freidson):《关于自由职业的理论:最新状况》,第26页;又见埃利奥特·弗里德森:《自由职业的权力》,第30—38页。

〔3〕 见查尔斯·麦克莱伦:《德国职业化的经验》。

〔4〕 玛格丽·萨瓦蒂·拉森:《关于专家和自由职业者,或如何无法把话说尽》,第29页。托马斯·布罗曼(Thomas Broman)认为,就德国的医生而言,职业化是关于如何捍卫,而不是取得,他们在工业化之前就享有的地位和权力。因此,关于职业化是现代化某些假设就需要重新思考。见托马斯·布罗曼:《职业化的再思考:18世纪德国医学界的理论,实践和职业理想》。“在我看来,德国的情况只表明不同社会中职业化和现代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